



小厂房 大奇迹

——抗战时期的赣州水东机器合作社

□李春媚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1979年,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跨越山海,再次踏上赣州这片土地。他就是曾在抗日战争时期与中国工人并肩奋斗、为“工合运动”倾尽心血的路易·艾黎。当他走进赣州的街道,时光仿佛倒流,往昔的点点滴滴如电影般在他眼前浮现。

江西气体压缩机厂的前身是赣州机器厂。1951年初,在赣州专署接管赣州水东机器合作社20多部大小机床后,赣州机器厂正式成立。而水东机器合作社的创建历史可追溯至1938年。彼时,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赣州作为后方重要城镇,承担着为抗战提供物资支援的重任。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和爱德加·斯诺等发起了“工合运动”,旨在通过组织难民和失业工人进行生产自救,为抗战提供物资支持。1938年,东南工合办事处(旧址在今赣州市西津路小学内)在赣州成立,路易·艾黎亲自到赣州筹备相关工作。

在东南工合办事处的支持下,水东机器合作社于1938年9月在赣南水东大庙前成立。这里汇聚了从安徽、浙江、江苏以及南昌、汉口等沦陷区辗转而来的工人。他们不甘心屈服于敌人的奴役,带着家眷逃至赣州。尽管得到了政府的收容和救济,但工人们凭借优良的生产、劳动传统,拒绝不劳而获的生活。

在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提供的4万元长期借款的激励下,工人们挑土、搬木头、运石头,建起了十几间简陋厂房。随后,他们从福建、宁波、浙西、韶关等地购置了19部机器和大批原料,并邀请了19位优秀技师,收集了完备的工具。在艰苦的条件下,水东机器合作社这座小型机器工厂就此建立。

经过8个月的艰苦奋斗,工人们成功制造了100多台小型机器,涵盖弹棉机、织布机、印刷机、榨油机、抽水机、肥皂机、磨面机、木炭引擎等多个品种。这些成果标志着赣州的机器生产迈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实现了从无到有的重大突破,为当地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他们还修复了江西公路局及各大工厂的汽船和机械配件。

翻砂间泥浆四溅,工人们满脸油污仍埋头苦干;机器间油烟弥漫,工人的脸庞被熏得黝黑;锻工部红热的铁花飞溅,打铁工的衣服被烧得破洞累累,宛如渔网;在模型部和钳工部,工人们挥舞着强壮的手臂,不分昼夜地忙碌着,为工业生产的发展拼搏奋进。工人们不辞辛劳工作的场景,让每一个目睹和听到的人无不为之振奋和感动。

他们的努力赢得了各方赞誉,赣南地区的数十个生产部门也因此受益。植物油、面粉、粮食、纸张、布匹的产量大幅提升,劳动的价值得到了应有的尊重。

水东机器合作社的招牌上醒目地写着“保证责任,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彰显着合作社的宗旨与精神。合作社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管理架构清晰高效。全体社员通过公选,产生了一位理事主席和四位监事,分别组成理事会和监事会。重要事项必须经过社员大会审议通过后,理事会才能执行,充分体现了民主决策的原则。合作社的工资根据工作强度和技术难度确定,体现多劳



多得的分配原则。工人们在艰苦条件下,拒绝外界的高薪诱惑,以实际行动展现了牺牲个人利益、顾全团体大局的团结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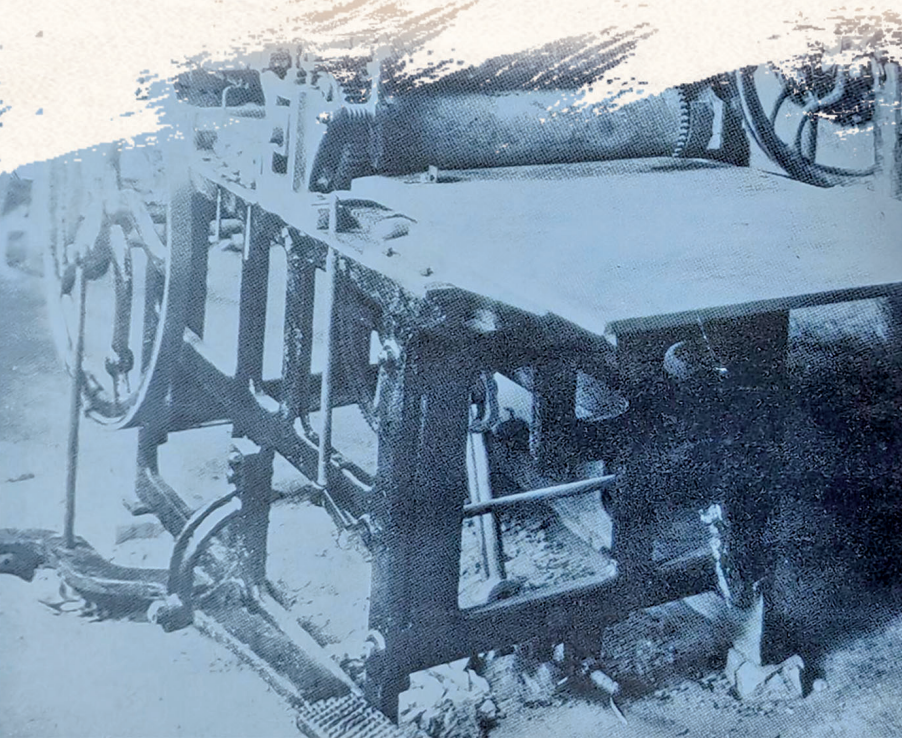
路易·艾黎对水东机器合作社的贡献是全方位的。他不仅深入车间,对于生产难题积极寻求解决方案,还努力改善社员的居住和饮食条件。1939年5月,路易·艾黎因奔波各地指导“工合运动”而过度劳累,在从屯溪到赣州的途中病倒,患上了伤寒和痢疾,卧床两个月。即便在病中,他依然牵挂着合作社的发展,其坚韧与奉献精神深深感染了每一位社员。1940年7月,为了表达对艾黎先生的感激与敬意,水东机器合作社全体社员制作了一幅写有“工人之友”的彩旗,并在社员大会上郑重赠予他。

水东机器合作社还在中共赣州市委的指导下成立了党支部,积极开展政治教育工作。党支部以夜校、图书室和俱乐部为依托,通过教唱抗战歌曲、编排演出话剧等多种形式,激发社员的爱国热情,使他们精神受到极大鼓舞,全身心投入生产劳动,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他们编排的抗战剧《黎明》在赣县联合公演中表现出色,赢得广泛赞誉。他们还把抗战宣传带到了乡村,用粉笔画写标语,传递抗日心声。在五·一劳动节,赣县各机关团体1000多人满怀热情参与了他们的庆祝活动。工人们饱含深情地说道:“我们从敌人铁蹄下逃离,从沉重的压迫中解放出来。我们深知自己所处的立场以及肩负的重大责任,定会将全部的血汗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国家和民族。”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处于关键时刻,亚洲战场战火不断。日本军队在中国南方地区造成严重破坏,美国空军派出装备新型B-24“空中堡垒”轰炸机的部队参战,但该轰炸机对起降场地要求极高,急需建设特级巨型机场。经勘察评估,大余县新城凭借地缘和地理优势被选为机场建设地。机场建设中,铁轨铺设急需枕木和道钉,枕木可就地取

材,道钉生产却陷入困境。东南工合办事处迅速集结水东机器合作社工人,投入生产。当时条件简陋,工人们采用手工锻造方式,每天工作时长超过12小时,仅用一周时间就完成了首批3000枚道钉的生产任务。据工人回忆,车间炉火昼夜不息,燃烧了整整七天七夜,工人们的脸被烤得通红,宛如燃烧的火焰,但他们毫无怨言,无人退缩。

1945年,日军兵临赣州城下。面对严峻复杂、危机四伏的形势,水东机器合作社的工人们毫无畏惧,奋勇向前。他们迅速而有序地将机器设备进行拆卸,并在敌军的重重封锁与威胁下,踏上转移征程前往会昌。一路上,山路崎岖难行,敌机频繁轰



炸,诸多艰难险阻接踵而至,但工人们凭借着坚韧不拔的意志与顽强拼搏的精神,成功克服重重困难,安全完成设备转移任务。抵达会昌后,工人们顾不上休整,立即恢复生产,全力以赴投入到为盟军修理器械件的工作中。他们凭借精湛的技艺,完成了价值50多万元的器械件修理任务,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时光荏苒,那些与路易·艾黎并肩奋斗的日子,以及工人们不屈不挠的精神,始终在赣州这片土地上延续。“努力干、一起干”的工合精神是跨越时空的力量,它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人,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只要团结一心、脚踏实地,就能创造奇迹。

即将离开瑞金,实行战略转移,中央红军卫生学校附属医院的医护人员纷纷忙开了,将医院的医疗设备以及学校的教材打包整装入箱,一切都准备就绪。这时,周恩来突然到访。周恩来表情凝重地说,陈毅在老雷盘指挥作战时,身负重伤,右胳膊被敌军弹片击中,造成粉碎性骨折。陈毅病痛了很久,但一直不知道具体伤在什么位置,必须用X光机拍片。而且,陈毅要继续留在中央苏区工作,所以现在使用X光机为其诊断显得十分迫切。

贺诚当即命令红军总卫生部医政局局长陈志方立刻打开箱子,重装X光机给陈毅拍片诊断。通过X光机查找到了陈毅腿部弹片的方位后,贺诚亲自为陈毅做手术。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努力,贺诚取出了卡在骨髓里的弹片和一些碎骨,保住了陈毅的右腿。

1935年2月,红军在长征途中召开了“扎西会议”,明确提出要对中央红军进行精简缩编。同时,为了减轻行军负担,要将那些带不动、不好扛的器械全部扔掉或者就地隐藏。

接到命令后,贺诚和陈志方等人千般不舍地将X光机及17箱医疗物资秘密藏在云南威信县扎西镇村民杨保和家的阁楼上。他们将捆得严严实实的草席压了又压,生怕“跑风漏气”,最后也只能依依不舍、含泪告别。因为这台“照病机”对他们来说,不是一块冰冷的铁疙瘩,而是他们的战友,是从死神那里夺回了无数将士生命的大功臣。

一台“照病机”的光辉使命

□汪行舟 刘善玖

在20世纪30年代,中央苏区有这么一台仪器,被红军指战员亲切称为神奇的“照病机”。它曾为王稼祥、曾山、陈毅、陈正人等领导“照过病”;为即将踏上长征路的30多名女红军战士进行过健康筛查;为数百名在战场上受过伤的女红军战士做过体检;被一群红军战士从江西瑞金一直抬着走过一段艰难旅途,最后被寄存在云南省昭通威信县扎西镇的一家农户的阁楼上,从而完成了它的光辉使命……它,就是这个故事的主角——一台X光机。

1933年4月的某一天上午,乌云密布,犹如巨大的泼墨画铺满长空。不甘心第四次“围剿”惨败的国民党采取了疯狂的报复行动,出动了6架飞机对中央苏区进行狂轰滥炸。

此时,正在江西乐安县谷岗村祠堂召开全军青年工作会议的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来不及隐蔽,被敌军飞机的流弹弹片击中了腹部。弹片击穿了他的肠子,血流不止,剧烈疼痛,生命垂危。

于是,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王稼祥忍着剧痛,用了近8个小时取出腹部的弹片。王稼祥的病情虽转危为安,但仍有部分弹片取不出来或是找不到位置,留在腹中折磨着王稼祥。这种椎心之痛严重影响到了他的工作和生活。毛泽东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于是请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想尽办法火速购买一台X光机送到中央苏区。

费尽周折,上海方面购买到了一台德国制造的X光机,并将体积庞大且笨重的

X光机拆散隐藏在棺材中,历经数月才运至中央苏区。

见到这么珍贵的宝贝,可把红军总卫生部部长贺诚高兴坏了,他深知这台机器对于治疗的重要性。可转眼间,他又愁眉不展,X光机的使用说明全是德文。于是他立即将在红军卫生学校任教的、懂德文的胡广仁叫来翻译和协助。

然而,就在X光机快要组装好的时候,胡广仁诧异地发现,少了一颗螺丝钉。螺丝钉虽然小,但是在关键部位起稳定作用。试了多次,没它还真不行,X光机不仅放置不稳,而且不能正常使用。怎么办?有人就提议找“能人”涂作潮来帮忙。贺诚立即派人去请红军无线电材料厂厂长“涂木匠”涂作潮。大家都认为是件棘手的事,可到了“涂木匠”这里却成了一件小事,没一会工夫,涂作潮居然手工搓出了一颗螺丝钉,而且大小很适合。

X光机很快组装好了,第一时间给王稼祥透视诊断。X光机的探头在王稼祥的腿部和腹部反复游走了十几分钟。“看到了,看到了。”具体操作人员胡广仁兴奋地叫了起来,他指着深深扎在王稼祥腹腔内盆骨旁的一块黄豆大的弹片。再探,发现还有其他位置也有碎片存留……通过X光机探寻弹片飞入的路径:弹片是从右下腹打入腹腔的,穿透结肠,嵌在了右肠骨窝上。

弹片是找到了,可无奈的是,当时条件太过艰苦,医疗设施简陋,根本无法进行手

术取出弹片,就只能保守治疗。

为了帮助更多的伤病员,贺诚让胡广仁在中央红军卫生学校附属医院创建一个X光照室,充分发挥X光机的作用,既可以分批分次地给体内有弹头、弹片的伤病员作诊断,又可以让更多的医护人员学习X光机的操作技术。当时在附属医院接受治疗的近百名伤势较重的伤残战士,甚至附近生病的村民都曾被X光机“照过病”。X光机对解决因伤势判断困难导致的救治、延误发挥了重要作用,降低了红军战士的伤亡率,成为战地医疗的“救命神器”。

之后,中央红军卫生学校和附属医院搬迁到瑞金城郊的朱坊乡洋江下。因此,这台X光机又迎来了新的任务,不仅要给伤病员拍片子,还要供红军卫生学校教学使用。作为学校的教学仪器与设备,学员可以了解X光机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尤其是第三期军医班的学员欧阳辉、周洪平等人,专门跟着胡广仁学过X光机的操作技术。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红军决定实行战略转移。

长征出发前,为了选拔一批身体素质好的女同志充实到红军的各条战线,中央组织部将从苏区各省、县妇女部调来的100多名女同志组织去体检。通过检查,有些女同志身体有各种情况,被刷下来几十人,有些被X光机查出了自己压根不知道的疾病,并及时进行治疗。

中央苏区严惩违规『下馆子』

□苏春生 廖九平

中央苏区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与老百姓“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军政一致、军民一致,锻造了“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孕育形成了彪炳史册的苏区精神和苏区干部好作风。苏区干部好作风是如何炼成的?是以上率下带出来的,是严明纪律管出来的,是强化惩治治出来的。党和苏维埃政府坚持从小事小节抓起,对干部违规“下馆子”行为进行严厉惩处,犹如一面作风建设的历史明镜,为当前全面整治违规吃喝提供了重要的历史镜鉴。

严惩明目张胆“下馆子”。针对毫不掩饰、公然违反规定利用职权公款吃喝、侵占公款的行为,党和苏维埃政府严厉曝光和处理。少共中央局巡视员郑茂德,在零都(今于都)巡视工作期间,偷窃县保卫局的骡子,而把自己骑去的马卖了,赚了8元钱。回来后与少共中央局的某些同志大吃大喝,最终被发觉。在严重警告之后,不但没有纠正错误,反而在工作上表现极端怠工,最后受到开除处分。独立第五团第一营六连副政委赵九苟,不去领导士兵,提高士兵的政治水平,反而大吃油饼,收受土豪大洋10元仅上报1元,9元尽入私囊。他还带领伙夫抽大烟,公然开路条给伙夫方便其找鸦片烟,该路条上面写着:“兹有本连,伙夫一名,出街找鸦片烟吃,希各机关步哨放行。”这已触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法律。门岭县洞头区军事部部长为欢迎该区模范团从白区打土豪回来,挪用打土豪的公款,大摆丰盛酒席七八桌,买了8元猪肉、1元豆腐、2元油,好酒两大坛。并且将打土豪的款子私藏了200多元钱,以“有病不敢吃药”为由,用公款购买洋参炖鸡,手上金手表、金戒指样样都有。此事被《红色中华》报曝光后,受到门岭县苏维埃政府和县军事部的严肃处理。

严惩挥霍公款“下馆子”。中央苏区的党和政府,对奢侈浪费、滥用公款在饭馆大吃大喝的行为,进行重打打击。小岔乡苏维埃政府两个月挥霍五百多块大洋,五天发一次“杂用费”“客饭费”二十多元,甚至将犯人伙食费当“伙食尾子”瓜分。这种贪污浪费现象,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是要严厉打击的。兆征县苏工农检察部负责管理通讯员工作的陈唐子,饭后经常在街上赊账吃东西。有一次走到龙山酒楼,竟然摆起官僚的架子,叫老板炒菜,要了猪腰一盘、鸭子一盘、面一碗、老酒一壶,一共吃了三十多角钱的酒菜。待老板向他要账时,他自知身上没有钱,难以走脱,就说过几天再来付。结果老板不肯,他就想了一个诡计,说道:“我是县苏的主席,你不相信,我的证章拿给你押当。”这种腐化的生活,实际上是苏维埃工作中最凶恶的敌人。《红色中华》报号召全体党员干部应当和这种腐化分子、腐化生活作坚决斗争。

严惩克扣侵占“下馆子”。中央苏区时期,对通过克扣、侵占本应属于战士或工作人员的钱粮,用于个人在饭馆吃喝享乐的行为,指名道姓地进行揭露并严厉惩处。瑞金县保卫分局管理员王立贵,每日克扣同志2两口粮,前后一共扣了35.5斤,积攒的米钱拿到街上去大吃大用。石城县新村少共区委书记温庆祯把上级发给部员的伙食费克扣了9元,拿去吃肉喝酒;在粮食突击尚未完成前便把该区委四个部员打发回家,贪污他们的伙食费;甚至把没收地主的 newly 被新服以及猪肉,拿来自己用,红军家属和劳苦群众要求分发,他还板起面孔说:“不行!不行!”在各地群众把一两米一分钱节省下来,帮助革命战争的热潮中,却出现了王立贵、温庆祯这种贪污分子。这些破坏节省运动的举动,直接影响了工农红军的给养。《红色中华》报指出,“前线上的战争更加紧急,后方群众的节省运动也正在猛烈的开展,在这一时期,一分钟也不要疏忽了这种贪污浪费的坏蛋!”

严惩挪用善款“下馆子”。瑞金互济会财务部部长朱宗英,将群众募捐的慰劳红军、救济被难群众的款子,采用收入不登账、虚报支出等手段,贪污了170多元。并且本来每天只有2人的客饭,朱宗英却领了5人的伙食1元9角。《红色中华》报提出,要向这种贪污浪费分子开展无情的斗争。赣南省黎川县儿童局书记马玉堂,把儿童团募来买平射炮的钱,用来进馆子、抽香烟等,工作一点不做,贪污大洋20多元,甚至到算账时一塌糊涂。经闽赣省儿童局调查后,马玉堂受到开除儿童团籍的处分。

严惩滥用特权“下馆子”。胜利县军事部的科员,在车头区潮屋乡整理和扩大赤少队的突击运动工作中,总是向群众说:“你们过了新年,要弄一点好酒好肉给我吃,我是县军事部派来的。”该科员因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被调离军事机关。万泰县部分苏维埃干部在乡村中作威作福,无论到哪里,都要群众预备酒肉给他们吃喝。除强行摊派与强迫命令之外,还常常利用募捐红军战费的名义,实行敲诈。万泰县苏维埃干部滥用特权、违规吃喝的行为,受到中央人民委员会的通报批评:万泰县苏完全没有了解县苏本身所负担的责任,而企图以“群众的落后”的机会主义者的陈腐套语,来掩盖自己在工作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中央财政部会计处许文亮,工作上一贯的消极怠工,是个十足的官僚主义者,思想上常常动摇。在战争紧张时期,请长假去汀州看老婆,并以财政部名义打电话给瑞金的财政部代买糖给他老婆吃,限定星夜送到,养成下级政府替上级私人办差的官僚恶习。像这样滥用特权的贪腐分子,留在苏维埃最高机关里面,无疑会破坏中央政府的威信。在中央工农检察部的号召之下,许文亮被公审,判决开除中央财政部会计处长之职。

吃喝问题从来就不是无足轻重的小事小节,它直接关乎党的形象与民心向背。中央苏区对干部违规“下馆子”的雷霆手段,看似惩治的是一个小事情,实则捍卫的是党和苏维埃政权清正廉明的形象,从而赢得了群众的真心拥护和爱戴,构筑起一道什么力量都打不破的“铜墙铁壁”。